

# 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之关系论

胡艳香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在本质上,侵权责任乃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依照传统的观点,在要不要考量行为人的主观过错上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是两个泾渭分明的对立体。但从法定义务的角度分析,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下隐藏着各种不同“人的影像”及法律对行为人高低不等的义务要求,通过“注意义务”之引线,两个责任体系构成一个首尾截然不同的连续体。

**关键词** 过错责任;严格责任;连续体

**中图分类号** DF5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07)02-0085-05

综诸现代各国立法、判例和学说,严格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归责标准和责任类别已得到普遍认可。大陆法系典型者有如法国、瑞士和荷兰,在民法典中确立严格责任一般条款,英美法系国家则通过典型判例和特别法规确立严格责任之重要法律地位。作为两种不同的归责标准以及以之为据的不同责任类别,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的关系到底如何?关于此,有人提出严格责任和过错责任是完全不同的对立物的观点,也有人认为两者实质上是一个首尾截然不同的连续体,更有人提出几乎无法区分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sup>[1]</sup>。学说上的众说纷纭,让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之间的关系增添或明或暗、扑朔迷离的色彩。本文拟以“法定义务”为视角,分析两种责任下隐藏着的“人的影像”及法律对行为人的义务要求,从而揭示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的关系实质。

## 一、法定义务视角下的过错责任实质

### (一)客观过错“人像”考

客观过错理论下,法律对行为人“过错”的评价是建立在行为的应受责难性上。行为人具有过错,在于他没有达到“善良家父”或“理性人”的行为标准。“善良家父”为罗马法以及后来的大陆法系国家所采,而“理性人”标准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创造。“善良家父”的标准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容,随客观情况不同而影像各异。在罗马法中,“善良家父”有时是一个身强力壮而又谨小慎微的赶骡人,有时是一个技术娴熟、不可

能开错药方的医生,有时还是一个决不会在有风的日子 里燃烧庄稼茬的农民……<sup>[2](439)</sup> 总而言之,“善良家父”是各行各业里那个行为合理、谨慎有加的标准人。在近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侵权法领域,“善良家父”这个判断过错有无的标准人像并没有比罗马法清晰多少,他仍旧是一个近在眼前远在天边的善变的精灵。但是,不管“善良家父”的影像如何变化,他总是与行为人同类性质、同类资质、同种能力和处于同样情况中的人的理性的行为标准相吻合,亦即为行为人所处的该种活动领域大多数人的行为标准。在英美法中,类似的模糊同样存在于对“理性人”的描绘,以 William L. Prosser 和 Lord A. P. Holbert 为典例,在前者的笔下,“理性人”是“被要求从事像一个非常完美的个人在其所处的境地时应当做的事。他兼具所有的优良品质,除非是那些社会在特定情形下能够容忍的缺点与毛病。他不同于那些时常会做不合理事情的凡人,他是一个经常符合要求的谨慎又仔细的人。”<sup>[3]</sup>在后者的极尽文学化的描述中,“……理性人总是替别人着想,谨慎是他的向导;‘安全第一’是他的生活准则。他常常走走看看,在跳跃之前会细心观察一番,他既不会心不在焉,也不会临近活动门或码头边还在冥想之中,他在支票存根上详细记录每一件事,并且认为是很必要的;他从不跳上一辆奔驰的公共汽车,也不会在火车开动时从车里走出来;在施舍乞丐前,总要细心打听每个乞丐的底细;抚弄小狗时总要提醒自己别忘了小狗的过去和习性;若不弄清楚事实真相,他决不轻信闲言碎语,也不谣传;他从不击球,除非他前

面的人确实已将他的球穴区弄得空无一物,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他从不对他的妻子、邻居、佣人、牛或驴子提出过分的要求,做生意时,他只求薄利,且要有像他这样的12个人都认为是公平的,而且他对生意伙伴、他们的代理人及货物所持的怀疑和不信任也是法律认可的程度之内,他从不骂人,从不赌博或发脾气;他信奉中庸之道,即便在鞭打小孩时,他也在默想中庸之道……<sup>[41]</sup> (455-456)不同的认识和描述向我们展示了“理性人”各种不同的侧面,但将其抽象起来,“理性人”莫不是法律对某一行业、某一社会阶层的人或者从事某种社会活动的人提出的普遍或一般化的要求,是法律用以判断行为人在其行为造成他人损害时是否承担过错侵权责任的注意标准。这种法定的注意义务标准因具体行业、活动的不同而高低各异,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以英美法为例,英国于1932年Donoghue v. Stevenson一案, Lord Atkin建立“邻人规则”,强调在可预见的损害行为,对于直接而密切受害之当事人负有注意义务。因“合理可预见”未能给具体案件提供确切答案,1978年Anns v. Merton London Borough Council一案,法院认为注意义务应有密切关联性,观察被告对于损害发生是否具有合理可预见。最后,通过1990年Caparo v. Dickman案件,发展出所谓“三阶段”模式:损害是否合理可预见(foreseeability);原告与被告之关系是否足够紧密关联(proximity);为保护一方之利益而对他方强加注意义务,是否合理公平而符合正义要求(just and reasonable)。在美国,1916年Macpherson v. Buick Motor Co.案建立了“普遍性的义务”(universal duty)概念,只要具有知悉或可得预见之危险,对于知悉或可得预见之受害人,即负担警戒之义务(duty of vigilance)。

## (二)主观过错“人像”考

主观过错理论下,法律对于行为人“过错”评价建立在行为入是否滥用其自由意志。因此,主观过错和客观过错理论在形式上的分歧焦点为:在对行为进行价值评价的时候,需要考察的是行为入主观的心理状态还是客观的行为状态。主观过错责任具有“惩罚”的价值取向。正如英国学者彼得·斯坦所言,因过失而支付的损害赔偿“是一种对做了某种错事而进行的惩罚。”<sup>[61]</sup> (54)然而,法律只能满足于调节和规范人的行为而绝非控制人的思想世界,况且它也无法直接去探究人的精神领域,因为依赖某种心理分析法或检验方法对人内在意志的探究以及对思想伦理道德应受非难性的考察根本不可能实现。鉴于此,在法律责任的评价机制中,只能通过行为的“中介”评价,最终达到对意志的评价。即使在主观过错盛极一时的年代,判断行为入在行为时的主观态度全然是比照一个比“理性人”或“善良家父”更具体的、与行为入具有相同条件的“人像”。在评价过程中,行为入的个人情况包括年龄、性别、缺陷、技能和资格,以及其当时所处的环境、

时间、行为的类型等因素都应当加以考察,并依据具体行为入的因素审查行为入是否对损害具有预见的可能性进而判断过错的有无。例如,在优士丁尼法典时期,主观过错的衡量标准为“尽处理自己事务的注意”;在法国民法典制定之初,主观过错理论也是从“可为过错的能力”(the capacity to be at fault)来判断责任的有无。<sup>[61]</sup> (95)因此,从实质上而言,主观过错与客观过错唯一的区别就是判断依据,前者综合考察各种因素,以一个与行为入条件相当的人为参照来判断行为入有无过错,而后者则是依据“理性人”或是“善良家父”处于当时情形下的行为方式而探询行为入的可归责性。

## (三)过错责任的实质

通过对客观过错和主观过错下的“人像”考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是主观过错责任还是客观过错责任,探究的都是行为入对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程度的行为模式。站在行为入角度,法律对行为入提出了“与行为入同样态的人”、“理性人”或“善良家父”所能达到的注意义务要求。如果行为没有满足这种要求,法律便对其进行否定性的评价。鉴于参照标准依具体情况而变化不定,过错责任法律对行为入的注意义务要求也就高低不同。其间有最一般的普通人之注意义务、专门职业人员之注意义务、特定活动经营者的注意义务等等,甚至在某些过错责任领域,不仅标准变得越来越难达到,而且过错(fault)与“错误(error)”也日渐混淆。可以说,过错责任法律对行为入注意义务的要求在极其普通的“中人”和一个近乎完美的“超人”之间徘徊,依据不同职业、不同活动随时调节。借用美国著名侵权法学家William Prosser的论断:“注意义务仅仅是各种政策考虑的总体表示,该政策所达成的结论是:原告有权受到保护。”<sup>[71]</sup> (356-359)正是由于这些行色不一的参照“人像”以及程度不一的注意义务,让过错责任呈现一种连续体的状态,这个连续体一端是最纯粹最普通的过错责任形式,而另一端随着注意标准之提高不断延伸。这种延伸的趋势特别体现在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重大灾难时,过错责任甚至将行为入的注意标准提高到“超人”的水平。例如,在旧的产品责任案件中,将有缺陷的产品带入市场就被认为构成过错。

## 二、法定义务视角下的严格责任实质

作为一种独立的归责原则和责任类型,严格责任通常是在补偿受害人的立场上被理解。那么,如果从法定义务的角度来审视严格责任法律对行为入的要求,将会得出怎样的一个结论?鉴于严格责任不像过错责任一样具有一个统一的参考指标“过错”,下面我们以动物监管人、产品制造者和核能经营者承担严格责任的条件为例来考察严格责任的实质。



## 1 动物致害责任

动物致害责任自罗马法时期起就是一种典型的严格责任。《十二铜表法》和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中都有对动物致害的明确规定。在现代民法中,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法律条款对动物致害的责任承担问题进行规定。法律不禁止人们拥有动物,毕竟动物对人类社会生活来说有其必要的功能。但是在提供人类诸多益处的同时,动物却是一个不断制造危险的来源,它本能地吃食和再生产、能运动但不能思考,可能毁坏财产、攻击人类、携带各种细菌和病毒。鉴于动物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法律规定监管人在动物造成他人损害时承担赔偿责任,不管动物的举动是“正常的”抑或“反常的”,甚至已经死亡的动物造成损害,监管人都要承担责任,除非证明他在事故发生前已转移监管、或者他是在实施“合理的”自卫、或是损害由不可抗力造成、受害人自冒风险。因此可以推导,从法律义务的角度,严格责任体系下的监管人对有可能受到动物威胁的一般公众负有“安全保有”的义务,即监管人必须负有防止动物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义务。一旦在其控制或管理之下的动物对他人造成伤害,监管人便违反了该法律义务,不管他对该动物的看管多么小心谨慎,也不管他能否阻止事故的发生。鉴于动物的举动几乎都由其本能引导,具有完全的不可预测性,监管人要确保管理下的动物不对他人造成损害,似乎有将其当作“超人”之嫌。

## 2 产品责任

综合各国的法律规定和相关判例,在普遍适用严格责任的条件下,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义务只向市场提供安全的产品,一旦产品的缺陷造成他人损害,则应承担赔偿责任。“缺陷”一词构成产品责任制度中的核心,根据各国关于产品缺陷概念的立法例,产品缺陷是指产品缺乏消费者或者使用者有权期待的安全性而对消费者或使用者的人身或财产具有的不合理危险,一般有设计缺陷、制造缺陷、警示缺陷和发展缺陷。除发展缺陷外,各国都将前三种缺陷作为承担产品责任的客观基础。关于对产品缺陷的判断,许多国家采取消费者期待标准(Consumer Expectation Test),按其倡导者德沃金的主张,任何人都不能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即使预防事故的成本高于事故发生的损害,也不一定会免于承担产品责任。对于那些仅供一般使用、构造相对简单的产品,按消费者期待标准,制造者或消费者提供安全产品的法律义务相对容易达到,但随着高新技术产品的不断出现,消费者有权期待的安全就超出了一般人的技术、知识和经验可识别的范围,加之消费者期待标准本身含义具有不明确性,制造者或销售者即使尽到了一切注意、采取了一切措施,即使产品生产符合国家的 product safety 法或行政法规,都无法确保产品不给人带来损害。因此,从法律义务的角度,严格责任

法律对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产品不导致他人损害”,这种法律义务已远非一个理性和谨慎的制造者和销售者所能企及。

## 3 核子致害责任

鉴于核子反应的特点以及造成损害的严重性,各国对核能开发及利用几乎都规定了严格责任,对经营核反应装置的人来说,除了武装冲突、国际战争、内战或颠覆行为等因素,对任何因核反应堆所造成人员或财产的损害都得负担赔偿责任,即使该经营者已采取各种力所能及的措施来加以防范。因此说,法律课给经营者的法律义务就是“不因核反应给他人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一旦损害造成,他便违反了对他人负有的法定义务,经营者不能以自然事件上的不可抗力进行抗辩。有些国家的核子致害责任法律甚至以这样的法理念为基础:如果物本身被认为是具有极度危险性,那么仅仅存有这种物就可以导致严格责任。<sup>[8][15]</sup>

以上仅仅是3类典型的严格责任,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法律对行为人在对待他人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的注意要求极其严厉,不管其在行为时如何尽心尽力,一旦造成了他人损害,便失于履行其法定的注意义务,贬低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在责任概念中排除道义非难和选择自由。因此,从法律义务的角度看,严格责任实质上是在近乎“超人”标准下规范和调节人们的行为。之所以法律对行为人作出如此严厉的要求,源于这些特殊领域的“危险性”。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危险越大,法定的注意义务程度越高。这体现了严格责任制度对人的终极关怀。另外,从以上例子我们也可以得知,严格责任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统一或确定的注意标准,这些“超人”随着具体环境而各有不同的面孔,有些超人是完美无缺、无所不能的,而有些超人则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这从不同行为人得以免除其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的多寡以及行为或管理的物本身存在的危险性程度之高低中可见一斑。例如,对管道煤气、电力经营者来说,虽不能以受害人过错或第三人行为为理由开脱,但不可抗力可以作为抗辩理由;而对核反应装置或航空运输的经营者来说,不可抗力都不是抗辩理由,有的国家甚至没有规定任何抗辩,即使因战争或是自然灾害所触发核反应堆事故或航空事故。因此,严格责任不是单一或同质的,而是一个有层次、不同质的体系,依法律对行为人的要求高低呈现出一个绝对严格到相对严格的连续体状态,在该连续体的一端,相对严格责任与过错责任通过法律对行为人的高度义务要求连接起来。

## 三、两种责任理论同存下的典例探析——以雇主责任为例

雇主责任,是指雇主对其雇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

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责任。这是一个世界通例,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总的原则是,如果雇员在其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造成了损害,雇主就要承担侵权行为责任。但是,对雇主责任的性质问题有“过错责任说”和“严格责任说”。以德国、西班牙、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为代表,采“过错责任”观点,仅仅承认雇主的直接责任;其他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采严格责任。

雇主“严格责任说”以法国为例,民法典第1384(4)条规定:“主人和雇主,对其仆人和雇员在执行他们的职务活动中所导致的损害承担责任。”以Lamber-Favire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雇主就其雇员的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責任并不是建立在雇主在选择或监督他们应对其行为承担责任的雇员的活动中所实施的某种过错的基础上,而仅仅是一种危险责任。<sup>[9][25]</sup>根据危险责任理论,如果一个人从他人所从事的活动中获得了利益,即应对他人活动所带来的危险负责,即便他没有应受责难的过错。因此,只要满足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雇佣关系、雇员实施了致害行为、雇员的致害行为是在执行职务活动中实施的这三个条件,雇主就要承担侵权责任。雇主不能通过证明他自己没有过错来免除责任,也不能通过证明雇员的行为对他而言是无法预见、无法抵抗的方式来免除责任,而只能就损害由受害人造成以及损害对雇员而言纯属不可抗力来进行抗辩。因此,从雇主角度而言,法律对其的法定义务莫不是“确保其获利的活动不给他入造成任何损害”。一旦事故发生,雇主便失于履行该法定义务。

雇主“过错责任说”以德国为例,民法典第831条规定:“一个人雇佣他人从事任何工作,有义务对后者在履行其工作中违法给第三人造成的任何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如果雇主在选任雇员时尽到了适当注意,并且在有义务对他人履行的工作提供工具和设备或对工作予以监督时他对提供此等工具、设备以及进行监督履行了通常的注意,则不承担赔偿责任。”对德国采取雇主自己的过错责任,一种传统的解释是,在19世纪潘得克吞学者们确信“选人过错”理论是罗马法中唯一认可的理论;另一种更为功利的反对意见在于间接责任将带来不受欢迎的经济后果,尤其是不利于小型工业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利益<sup>[10][677]</sup>。尽管如此,德国判例对雇主责任中“过错标准”的诠释一步步严格。起初帝国最高法院只是在雇主对工作的执行给予了指指导的情形才认定承担推定的疏于监督的责任,但很快便接受了《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的一般监督义务的观点,通过认定违反一般注意义务的责任来扩大对雇主责任的适用。紧接着4年后,最高法院声明“雇员对在执行给第三人造成伤害的事务时必须是有能力执行安排给他的这一事务的,本人必须证明在其选任雇员时履行了适当的注意义务。”<sup>[11]</sup>于是“只有被适当监督的雇员才被认定为适当选任”很快被确

认,雇主证明自己没有疏于适当指示和监督其下属变得相当困难,因为有时雇员唯一的一次未能完成工作也可能表明其一贯不能胜任。1951年后,“组织上的过失”和“雇员的解放请求权”为雇主承担责任提供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工具。从雇主的立场来看,《德国民法典》第831条第2段的范围再次大大缩小。除此,为避免适用第831条要求证明雇主过错的存在,德国判例将规定于民法典第278条的对下属的责任适用于现存的债的关系,缔约上的过失理论、合同上的注意义务和对第三人具有保护效力的合同迅猛发展,著名的判决有亚麻绒毯案、燃气热水器案、香蕉皮案和菜叶案。<sup>[11]</sup>在德国雇主责任迂回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法院已越来越意欲通过要求他们证明他们的整个组织、工作和监督体系,以及他们权力的内部分配是足够好的(而这种足够好意味着由法院想要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来向雇主施加更大的压力。<sup>[12]</sup>对雇主注意义务的不断提高以及司法实务中的“绕道而行”,使“直接的”过错责任实质上已经变成“间接的”严格责任,雇主只有在证明其雇员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逃脱责任;“选任和监督上的过失”已逐渐成为历史的残迹。例如,联邦最高法院(Bundesgerichtshof)分别在1969年2月18日和1975年10月7日的案件中判定雇主“必须在一个持续不断的基础上对司机或行为入进行监督”<sup>[10]</sup>以及“对独立承包商负有额外的注意义务”。<sup>[10]</sup>事故一旦发生,法院的注意力就集中到雇主设计的用以避免或减少事故的发生的内部监督制度上。如此一来,将雇主的“过错”提高到几近“超人”的程度,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实际上与雇主应对其活动所产生的危险负责的严格责任没有多大的区别。

因此,从对雇主责任之性质的不同观点及其法律制度安排上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法律课高度注意义务的行为领域,徘徊着一个既像过错责任又像严格责任的幽灵,寻找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断然分开的界限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对某些侵权行为,有的国家采用严格责任来实现对受害人的赔偿,而有的则要求行为入符合更高注意标准的“理性人”的身型,通过适用“过错”的概念获得同样的效果。例如,在处理因电缆造成伤害的案件时,德国现在通过适用一种强制承担严格责任的特别法律来加以解决,而在美国则通过扩充过错的概念来达到目的,但是这两个体系加以解决的结果非常类似。正是通过“高度注意义务”这一桥梁,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两个体系之间以一个模糊区间交叠起来。

## 四、结论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和典例探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以法定义务为视角,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



构成一个首尾截然不同的连续体。依照传统的观点。主观过错责任理论将“过错”与“违法性”相分离,以主观心理状态的可非难性为归责基础,而严格责任的产生不以潜在侵权责任承担者的主观意志上过错的有无为要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是否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尽管承担严格责任的判决并不必然意味着被告曾是合法和公正地行为。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在“要”与“不要”考量行为人主观过错上是两个泾渭分明的对立体。但从主观过错的最终判断路径,即主观意思的探求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人的行为上来分析,严格责任与主观过错责任的不同仍然是法律对行为人的法定义务要求程度上的不同。在客观过错理论下,过错责任是法律强制行为人承担因违反了“理性人”或“善良家父”标准的注意义务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法律后果。因此,从实质上言,隐藏在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体系下的是各种不同的“人的影像”以及法律对行为人高低不等的义务要求,随着行为或活动对人们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造成损害的危险越大,法定义务的要求越高。正是通过这层层严格递进的行为人对他人

参考文献：

[1] POWERS. The Persistence of Fault in Products Liability[M]. 61 TEX L REV. 1983.777.  
[2] (古罗马)优士丁尼,徐国栋.法学阶梯[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 WILLIAM L. Prosser, Handbook of The Law of Torts[M]. West Publishing Co.1971.  
[4] (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张军.法和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5] 彼得·斯坦.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  
[6] F. PARASI. Liability for Negligence and Judicial Discretion[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2, (2).  
[7] W. P. KEETON, DAN B. DOBBS, ROBERT E. KEETON, DAVID G. Owen, Prosser and Keeton on Torts, Fifth Edition[M].

的法定注意义务的串联,过错责任与严格责任在整个责任体系下呈一种连续体的状态。

第二,过错责任将“理性人”注意标准不断提高,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向严格责任领域渗透。根据过错责任原则之价值取向,“尽处理自己事务注意的行为人”、“理性人”或“善良家父”的义务标准只不过是一种具备社会中一般人所拥有的经验见识和逻辑推理能力的普通人的谨慎(ordinary care),法律以此种评价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要对其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这种理念在一个关心不让一些人担负责任多于关注立即补偿每一个损失的年代来说,具有其独特的魅力。但随着19个世纪下半叶机械工业的发展和事故的大量增加,过错理论之权威地位受到越来越认真的审查,为捍卫其在侵权领域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同时实现赔偿不幸的受害者之法律愿望,过错责任在某些新近出现的侵权领域将“理性人”的注意程度提高至几近“超人”之标准,此时的过错责任实际上已与严格责任无异。不幸的是,在过错责任过分追求其统治地位、不断拓展其范围时,已与其本来含义相去甚远。

West Publishing Co., 1984.  
[8] SEE B. A. KOCH / H. KOZIO. Unification of Tort Law : Strict Liability[M].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9] 张民安.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10] B. S. MARKESINIS. The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 Volume 1, The Law of Tort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 (德)克雷蒂安·冯·巴尔,张新宝.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12] F. H. LAWSON, B. S. MARKESINIS. Tortious Liability for Unintentional Harm in The Common Law and The Civil Law[J].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Volume 1: text.

[责任编辑:周玉林]

(上接第81页)

参考文献：

[1] (美)迈克尔·D·贝勒斯,张文显.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4.  
[2] 李昌麒.经济法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57,30,60,61,62.  
[3] (德)卡尔·拉伦茨,陈爱娥.法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馆,2003.59.  
[4] (美)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施少华,姜建强,张军.法和经济学(第3版)[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245.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3.  
[6] 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64.  
[7] 邵诚,刘作翔.法与公平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2.  
[8] (英)J·M·奥利弗,张箭春.法律和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83.  
[9] 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周玉林]